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单向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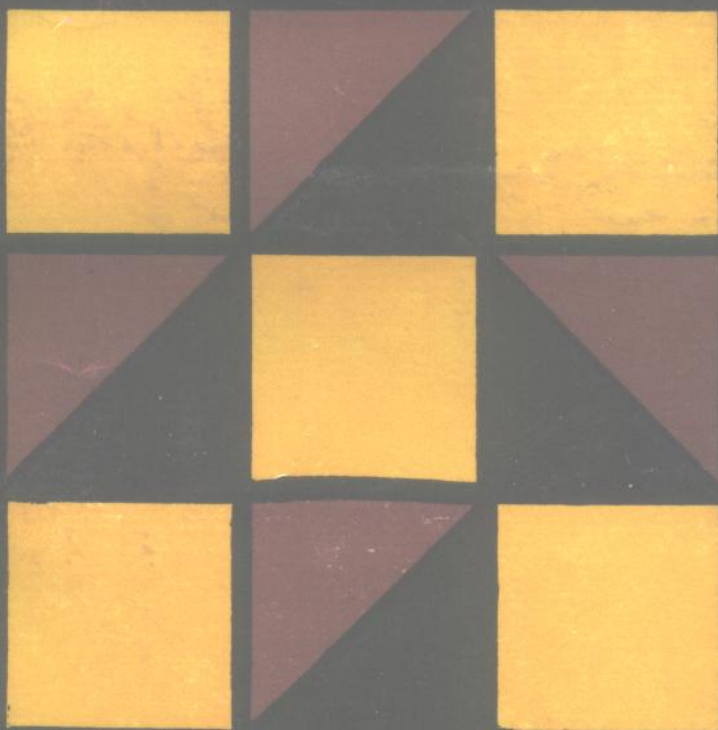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One Dimensional 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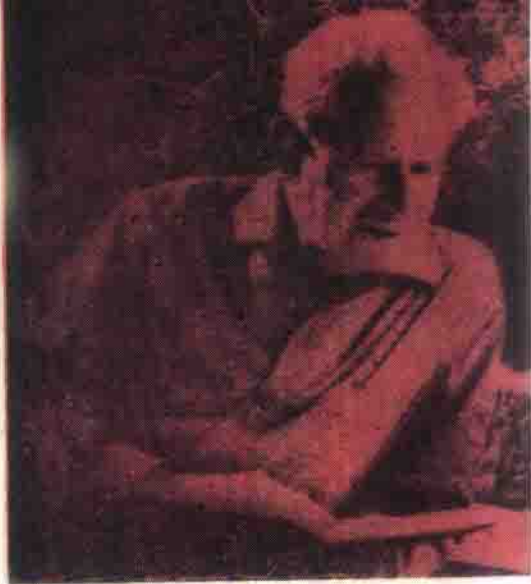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刘 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One Dimensional Man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刘 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8

根据伦敦劳特利奇—基根·保罗有限公司1968年版译出

单 向 度 的 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刘 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 海 译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875 插页 3 字数 178,000

1989 年 2 月第 1 版 198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500 册

ISBN7-5327-0481-5/B·031

定价：3.15 元

06/10/16
译者的话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最为知名的激进哲人。1898年生于柏林一个犹太人家庭。1917—1919年曾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卢森堡被害后，因不满该党的背叛行为而退党。脱离政治运动后，先后就学于柏林大学和弗赖堡大学，接受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指导。1923年获博士学位。1929年他撰写的申请讲课资格的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理论的基础》，因与导师海德格尔的政见相左而未能获得通过。1930年经胡塞尔请法兰克福大学董事 K·里茨勒介绍，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1934年，由于纳粹的反犹主义日益猖獗，马尔库塞流亡到美国，并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战争期间曾任华盛顿战略服务局研究员。1950年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东欧科代理科长。1954年在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工作。1954年去勃兰第斯大学任教，直至1967年才转至加利福尼亚大学。1979年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之邀赴西德讲学，是年7月29日在施塔恩堡与世长辞。

马尔库塞的主要著述有：《理性与革命》（1941年）、《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1941年）、《爱欲与文明》^①（1955年）、《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年）、《单向度的人》（1964年）、《文化和社会》（1965年）、《革命伦理学》（1966年）、《否定》（1968年）、《论解放》（1969年）、《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1969年）、《从路德到波普

^① 《爱欲与文明》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7年翻译出版，收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尔》(1972年)、《反革命与造反》(1972年)、《审美的向度》(1977年)。

《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最负盛名的一部力作。这部著作的中心论题是：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向度”(dimension)一词又可译作“方面”和“维度”，这里把它译作“向度”，主要是想传达原文中的价值取向和评判尺度的意思。

“单向度”这个术语今天已成为最脍炙人口的概念之一。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这正是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特征的集中表现。

在马尔库塞看来，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主要不是表现为是否施行恐怖与暴力，而是表现为是否允许对立派别、对立意见、对立向度的存在。当然，这里的“对立”是在质的意义上说的。

马尔库塞说当代工业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那是因为，从政治领域看，它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因而消除了危害社会继续存在的政治派别。今天，不仅先前作为政治反对派而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放弃了暴力夺取政权的主张，而且一度是社会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也随着机械化对劳动量和劳动强度的减低，随着蓝领工人白领化、随着非生产性工人的增加，而逐步丧失了其否定性和革命性，并与往日的敌手联合起来。

其次，从生活领域看，发达工业社会还使人的生活方式同化

起来。工人和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漫游同样的风景胜地，打字员同她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连黑人也有了高级轿车。由于生活方式的同化，由于大家都“分享制度的好处”，以往那种在自由和平等名义下提出抗议的生活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再次，从文化领域看，高层文化也与现实同一起来。高层文化本来与现实相疏远、相脱离，而这种疏远化的特征正是高层文化能够保存与现实不同的另一向度的关键所在。今天，高层文化与现实的“间距”已被克服，“文化中心变成了商业中心，或市政中心、政府中心的适当场所”。早期资本主义文学中那些反叛角色现在已被征服，当代文学中那些歹徒、明星、荡妇、民族英雄、垮掉的一代、实业界巨头，都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而只是想象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型。理想本是超越现实的东西，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就不再有理想，或者说理想已被现实所超越、同一。这样，表达理想的高层文化便不再能够提供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不再具有同现实有根本区别的另一向度。

最后，从思想领域看，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也标志着单向度思维方式、单向度哲学的胜利。实证主义、分析哲学本身就是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单向度的哲学，因为它把语言的意义同经验事实和具体的操作等同起来，并把既定事实无批判地接受下来，从而把多向度的语言清洗成单向度的语言。同时，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还宣称要对语言中的“形而上学”幽灵进行治疗，并反对哲学家去干预日常语言的使用。但是，既定的事实并不一定是应该接受的事实，形而上学幽灵可能比其对立面对面更加合理，而我们的日常语言在一个单向度的社会里也是早已受到操纵和灌输的语言。最重要的是，推翻既定现实“是哲学的任务”。如

果我们不能干涉日常语言的使用，如果我们不能超越日常语言环境去探讨造成这一环境的社会，而社会又只讲自己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只能顺从社会现状，再不能做其他事。因此，分析哲学的治疗任务乃是“一项政治任务”，它对语言的清洗实际上是对大脑的清洗。它的胜利表明了“肯定性思维方式”的胜利。

总之，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不过，它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造成它的极权主义性质的主要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可以通过电视、电台、电影、收音机等传播媒介而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从而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技术的进步使发达工业社会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平上，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技术的进步还使发达工业社会握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火箭、轰炸机、原子弹、氢弹……。简言之，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发达工业社会虽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但毕竟是一个舒舒服服的不自由社会；虽是一个更有效地控制着人的极权主义社会，但毕竟是一个使人安然自得的极权主义社会。这就是它的新颖之处。

在马尔库塞看来，要从这一社会中解放出来，前景是十分黯淡的。由于人们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的和创造性的内心向度的丧失，人们似乎根本不会再提出或想到要提出什么抗议。最有希望提出抗议的，是青年学生、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无业游民、其他种族的受迫害者、失业者等等。他们最少受到这一社会一体化趋势的影响，也最少分享制度的好处，因而可能还存有一定的批判性、否定性的向度。所以，马尔库塞最后引用本杰明的一句话来作全书的结束语：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的上述观点，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一贯思想的体现和发展。^① 由于用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而不是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没有真正揭示造成当代资本主义弊病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最后得出无产阶级革命性已经蜕化以及解放前景十分黯淡的悲观结论。《单向度的人》一书出版后不久，欧洲爆发的1968年“五月风暴”由于得到了法国近千万工人的支持，强烈地震撼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也迫使马尔库塞在其后来的《论解放》、《反革命与造反》等著作中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此外，马尔库塞在本书中批判当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弊端的同时，也有个别地方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命题发表了“离经叛道”之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倾向，相信读者会明辨是非，批判地加以分析和思考的。

本书的导言和第十章由郑杭生老师对照原文，仔细地进行过校阅。书中的法文、德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分别得到了陈宣良、冯俊、余纪元、李秋林几位朋友的帮助。在翻译过程中，还接受了陈维纲和罗佳同志的一些意见。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刘 继

1987年9月

于中国人民大学

^① 参见拙作《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
——译者

致 谢

我的夫人对本书的观点至少负有部分责任。我对她表示无限的感激。

我的朋友小巴林顿·穆尔通过他的批评性意见给了我很大帮助；在长达数年的讨论中，他促使我去澄清我的思想。

罗伯特·S·科恩，阿诺·J·迈耶，汉斯·J·迈耶霍夫和戴维·奥伯，在不同阶段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美国学术委员会，路易斯·M·拉比诺维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给我以惠助；他们的惠助大大促进了本书的完成。

导 言

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

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防止这一灾难的种种努力掩盖了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的潜在原因的探究。这些原因还没有被公众所认识、揭露、抨击，因为公众在一切来自外部的即东方对西方、西方对东方的极其明显的威胁面前退却了。同样明显的是，必须进行战争准备，必须生活在战争的边缘，必须面对挑战。我们不得不和平地生产毁灭的工具、不得不极度地浪费、不得不接受防卫训练，这种防卫使防卫者和他们所防卫的东西成为畸形。

如果我们试图把这一危险的原因同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其成员的方式联系起来，那末我们就会立即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在使这种危险永恒化的同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庞大、更加美好。社会的防卫结构使为数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更加舒适，并扩大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把特殊利益作为所有正常人的利益来兜售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社会的政治需要变成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它们的满足刺激着商业和公共福利事业，而所有这些似乎都是理性的具体体现。

然而，这个社会作为总体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

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对各种平息（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不同于在我们的社会之前的较不发达阶段的压抑；它今天不是由于自然的和技术的成熟状况而起作用，而是依靠实力地位起作用。当代社会的力量（智力的和物质的）比以往大得无可估量——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人统治的范围也比以往大得无可估量。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

研究这些发展的根源，考察它们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之一。这一理论根据社会已被利用的、尚未被利用的或被滥用的改善人类条件的能力来分析社会。但是，这样一种批判的标准是什么呢？

价值判断肯定起着作用。已确立的组织社会的方式是相对于其他可能的方式而得到评价的，也即是说，是相对于那些被认为对缓解人的生存竞争提供了较好机会的方式而得到评价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实践是相对于它自己的各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而得到评价的。因此，从一开始，任何社会批判理论都会遇到一个历史客观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两点，而对这两点的分析都暗含着下述价值判断。

1. 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或者可能是和应当是值得过的。这个判断是一切理智努力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前提，否定它（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是否定理论本身；

2. 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改善人类生活的特殊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殊方式和手段。批判的分析必

须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这种证明又必须在经验基础上来进行。已确立的社会，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可供利用。这些资源怎样才能被用来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才能，并把辛劳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呢？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因此，在组织和利用那些可用资源的各种可能方式和实际方式中间，哪些为最佳发展提供着最大的机会呢？

回答这些问题要求一系列初始的抽象。为了辨明和确定一种最佳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对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利用中，从这种组织和利用的结果中来进行抽象。这样的抽象拒绝把事实的给定领域当作有效性的最后根据，而对事实的这种“超越”性分析，是按照它们被阻碍和被否定的可能性来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抽象和分析适合于社会理论的结构本身。它由于“超越”^①的严格的历史性而与所有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上述“可能性”必须处在各个社会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它们必须是实践的可以确定的目标。同理，从已确立的制度中进行抽象必须是对一种实际倾向的表达——这就是说，制度的改变必须是作为根基的民众的实际需要。社会理论涉及这样的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些替代性选择常常作为颠覆性的趋势和力量出没于已确立的社会。当它们由于历史实践而被变成现实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就变成了事实。那些理论概念则随社会变化而告终。

但是，在这里，发达工业社会却使批判面临一种被剥夺基础

① “超越”和“超越性”这两个术语始终是在经验的、批判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它们表明理论和实践中这样的倾向，这些倾向在既定的社会中超出已确立的思想和行动的范围，而趋向于它的历史的替代性选择（现实的可能性）。

的状况。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制度的各种势力，并击败和拒斥以摆脱劳役和统治、获得自由的历史前景的名义而提出的所有抗议。当代社会似乎有能力遏制社会变化——将确立根本不同的制度、确立生产发展的新方向和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的质变。这种遏制社会变化的能力或许是发达工业社会最为突出的成就；在强大的国家范围内，大多数人对民族目标和由两党支持的政策接受，多元主义的衰落，企业和劳工组织的沟通，都证明了对立面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既是发达工业社会取得成就的结果，又是其取得成就的前提。

把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阶段和它目前的情况作一个简要的比较，也许有助于表明批判的基础是怎样被变更的。在19世纪上半叶它刚刚起源并制定出一些历史替代性选择的 最初概念时，工业社会的批判在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需要与目的之间的历史调和中得到了具体实现。这种历史调和存在于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政治行动中。在资本主义世界，这两大阶级仍是基本的阶级。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使他们不再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因。维持和改善现制度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先前的敌手联合起来了。技术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保证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吸引力，质变的概念就以多大的程度在一种非爆炸性发展的现实主义主张面前退却。由于缺乏社会变革的明显动因和代理者，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这里没有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的基础。甚至对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极其经验主义的分析看起来也是一种不现实的思辨；对它们的赞成与否则是一种个人（或集团）爱好的问题。

那么，这种缺乏是否驳倒了批判理论？面对明显矛盾的事实，批判的分析仍然坚持认为质变的需要像以前一样迫切。谁需要质变呢？回答还是一样：整个社会，因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增长着的生产力和增长着的破坏性的统一；毁灭的外交冒险政策；思想、希望、畏惧对现政权所作决定的屈从；前所未有的富裕中保留着的痛苦，这一切都构成了最为公正的控诉——即使它们不是这种社会存在的根据而只是它的副产品：它那在广阔范围内促进了效率和进步的合理性，其自身就是不合理的。

绝大多数人接受和被迫接受这个社会，并不能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合理性，使它少受指责。真意识与假意识的区别、真实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区别仍然是有意义的。当然，这种区别本身必须是有效的。人们必须看到这种区别，并找到从假意识到真意识、从眼前利益到真实利益的道路。人们只有生活在这样的需要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否定那种肯定的东西并对之加以拒绝的需要。而已确立的社会设法要压抑的正是这种需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履行诺言”，它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科学地征服自然用于科学地征服人。

面对发达工业社会成就的总体性，批判理论失去了超越这一社会的理论基础。这一空白使理论结构自身也变得空虚起来。因为批判理论的范畴是在这样的时期得到发展的，在这个时期，拒绝和颠覆的需要体现在有效的社会力量的行动之中。批判理论的范畴实质上是一些用来规定19世纪欧洲社会实际矛盾的否定概念和反对概念。“社会”这一范畴本身表示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尖锐冲突，社会是一种与国家对抗的东西。同样，“个人”、“阶级”、“私人”、“家庭”曾经是指还没与已确立的生活条件一体化的那些领域和力量——紧张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

业社会日益发展的一体化，这些范畴正在丧失它们的批判性涵义，而趋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术语。

那种想重新获得这些范畴的批判性内容并理解这一内容如何为社会现实所抹掉的企图，似乎一开始就是一种倒退，即从参与历史实践的理论向抽象思辨倒退：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向哲学倒退。批判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导源于下列事实：它的分析是站在“超乎”社会中肯定的和否定的、建设性的和毁灭性的东西的立场上勉强进行的。当代工业社会是这些对立面的普遍同一——这是一个成问题的总体。同时，理论的立场不可能是纯思辨的立场。就它必须以既定社会的能力为基础而言，它必定是历史的立场。

这种含糊不清的情况包含着一种甚至更为根本的含糊性。《单向度的人》将始终在两种矛盾的假设之间摇摆不定：(1)对可以预见的未来来说，发达工业社会能够遏制质变；(2)存在着能够打破这种遏制并推翻这一社会的力量和趋势。我并不认为能够作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两种趋势一起存在着，甚至一种趋势就存在于另一种趋势中。第一种趋势是主要的，并且任何可能存在的推翻这一趋势的先决条件都正被用来阻止它。或许，一个偶然的事件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但除非是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认识扭转了原来的意识和人的行为，否则即使是一场大动乱也不会带来这种变化。

分析的焦点是发达工业社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技术装备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因素，不是作为脱离其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的总和，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在这一社会中，生

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这些控制的极权主义倾向看起来还在另外的意义上维护着自己：把自己扩展到世界较不发达地区甚至前工业化地区，并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与共产主义发展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

一个社会用以组织其成员生活的方式，涉及到在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固有水平所决定的种种历史替代性选择之间进行一种初始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本身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发生作用的结果。它预定了改变和利用人以及自然的特殊方式并排斥其他的方式。它是在他者中自我实现的一种“谋划”^①。但是，一旦这种谋划在基本制度和基本关系中得以实现，它就趋向于变成排他性的，并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世界，是实现一项特殊历史谋划的最后阶段，即在这一阶段上，对自然的实验、改造和组织都仅仅作为统治的材料。

随着这项“谋划”的展现，它就形成话语和行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范围。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

^① “谋划”(project)一词强调在历史决定中自由和责任的因素：它把自主性和偶然事件联系起来。让-保罗·萨特在他的著作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

在讨论发达工业社会这些为人熟知的趋势时，我很少注明具体的参考文献。本书的材料是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所收集和叙述过的，这些文献论述了技术、社会变化、科学管理、合作企业、工业劳动的性质和劳动力方面的变化问题。有许多对事实进行非意识形态分析的作品，诸如伯利和米恩斯的《现代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第76届国会国民经济临时委员会关于《经济力量的集中》的报告；美国劳联-产联关于《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的各种出版物；此外还有在底特律的《新闻与通信》与《通讯》杂志。我想强调一下C·赖特·米尔斯著作的根本重要性，强调一下人们往往因其简单化、过甚其词或新闻式文字而对之表示不满的那些文章的根本重要性；万斯·帕卡德的《隐藏着的说客》、《想往上爬的人》、《制造浪费的人》；威廉·H·怀特的《驯顺的职员》；弗雷德·J·库克的《战争国家》，都属这一类型。诚然，这些作品由于缺乏理论分析而使所描述状况的根源被掩盖和保护起来，不过所描述状况的根源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状况足够说明问题了。或许大多数有力证据都可以通过下述办法来获得，即在几天之内连续收看电视或收听调频收音机一小时，不用中断广告节目，不时调换一下频道即可。

我的分析集中于当代最发达的那些社会。在这些社会内外还有许多地区并没有流行上面所描绘的趋势——我要说，尚没有流行。我是在设想这些趋势并提供一些假设，仅此而已。